

民国第一案



山东人民出版社

民 国 第 一 案

王作贤 贺荣第 常文涵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济南

民国第一案

王作贤 贺荣第 常文涵 主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华光Ⅲ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排版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19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900

ISBN 7—209—00672—9

K·73 定价：3.75元

序 言

陈立良

《民国第一案》这本书，写的是1923年发生在山东省临城（今薛城）附近的一次轰动中外的劫车案。因为它是发生在民国时期的第一个重大案件，所以被称为“民国第一案”（亦称“临城劫车案”）。在此案发生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国海峡两岸仍有许多人在不断地传说着、议论着，还有的正在著文创作，对此案进行介绍、评析和搬上影视屏幕。由于当时缺少最有权威性的报道，当局者又不公布有关案件真相，因此，至今此案仍蒙着一层神秘色彩，甚至以讹传讹。如有的将劫车土匪头目孙美瑶，说成曾和伟大的民主革命者孙中山先生有联系，并接受他的革命政治主张，“打击贪官污吏，建立耕者有其田、人人平等制度”，是一个“革命党人”；有的把劫车土匪比作梁山英雄，看成是：“抗击官府，劫富济贫”的“义军”。自然，更多的人认为他们是打家劫舍、“绑票”勒索、残害百姓的土匪。

到底怎样认识和评价此案？《民国第一案》这本书的编者，经过多年研究，查阅了大量的有关资料，经过筛选整理，向读者作了详细、完整的介绍，足以校正视听。本书所收入的北洋政府与有关军政当局的来往文电、各国驻华使团的文牒和信函，以及我国关心此案者的调查、此案参加者的回忆等资料，具体而真实地记述了此案的发生、经过和结果。其中，有不少资料属首次公诸于世。

“民国第一案”发生在那个年代，是历史的必然。在那多灾多

难的旧中国，农民生活毫无保障，少数人便铤而走险。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当年，以抱犊崮为贼窝的土匪，主要构成就是贫穷的农民和被裁减无业的兵痞之流。他们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很大破坏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

以孙美瑶为首的土匪，结伙拦劫列车，想以此要挟北洋政府，逼迫围剿他们的官兵撤退，并要求政府招安，收编他们为正式军队。这一着棋的产生，客观上是北洋政府及其军队造成的。因为盘踞在抱犊崮山区的土匪，一两支大帮的不足一二百人，小帮的只有几十人，全部加起来不过千余人，根本没有统一的指挥，这对于当时握有洋枪洋炮的北洋政府军来说，要彻底消灭他们并不难，但北洋政府军却年年剿匪，年年匪情不断，乃至兵匪勾结、兵匪难分，于是土匪竟敢与政府军斗智。出乎土匪意料之外，在列车上竟然绑了“洋票”（被劫持的外国人）20余人，他们深知北洋政府害怕“洋人”，因而在与政府谈判时，要价一再提高，从招安后编为一个师升格为三个师，并用拖延谈判向政府施加压力。北洋政府在与土匪谈判中，不断受到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质问诘难，甚至发出种种威胁，要夺走我国的铁路主权，赤裸裸地表现出帝国主义对我国主权的藐视，反映了北洋政府的软弱可欺。此时，北洋政府忙于争权夺利，割据分地，根本没有爱民治国的意识。经过十分曲折复杂的谈判，土匪们最后被北洋政府调派的飞机所震慑，不得不达成协议，全部释放“肉票”（被劫持的旅客和村民），土匪被编成一个招安旅，下山驻枣庄。最后土匪头目孙美瑶又中了埋伏，在“鸿门宴”上被杀。接着便树倒猢猻散，招安旅全部瓦解。至此，北洋政府形似取得了完全胜

利,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1000多名土匪离开枣庄,又呼啸而聚于抱犊崮,继续拉杆子,重操旧业。轰动一时的劫车案算是了结了,可是匪患并没有消除,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匪患问题才彻底解决。这些,足以说明土匪的存在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根本消除不了产生土匪的根源。

今日盛世,山东的广大农民早已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现在翻阅记述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民国第一案”,不仅能使我们深刻认识我国过去痛苦的历史,而且也能使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民国第一案”,案情曲折复杂,曾经轰动中外,而且本书所提供的史料,还具有许多真实、惊人场面和传奇式的情节。所以这本书的出版,为史学界、文学界对此案的研究和创作,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是评价“民国第一案”和孙美瑶土匪集团的重要依据,也是创作文艺作品的宝贵素材。由于本书汇集的资料比较全面、系统、真实、生动,编排上有案件始末的全面介绍,有分类编辑的历史资料,还有当事人的回忆,所以它不仅是一本比较珍贵的史料书,甚至也可当作一本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故事阅读。

1989年10月

目 录

民国第一案始末	(1)
当年抱犊崮的匪情.....	(2)
官军进剿抱犊崮.....	(7)
临城劫车	(14)
官匪交涉	(23)
收编和诱杀孙美瑶	(42)
外交上的余波	(51)
 历史资料	(61)
临城劫车集团简况	(61)
劫车经过与被劫乘客的遭遇	(63)
外交次长访英、意公使会晤录.....	(82)
外国驻华使团的干涉与诘责	(85)
北洋政府军中将梁上栋报告书	(99)
北洋政府军进剿劫车集团的布置.....	(104)
北洋政府与孙美瑶谈判纪要.....	(120)
孙美瑶在与北洋政府谈判时发表的通告.....	(126)
与孙美瑶有关系的重要人物.....	(127)
北洋政府对劫车集团的招抚改编.....	(129)
十六国通牒和北洋政府的复牒.....	(151)
新编旅的缴械与处理.....	(157)
中兴煤矿公司驻枣庄矿管理处与总公司	

(驻天津)的来往函电.....	(158)
回忆与专题记述	(169)
忆临城劫车案.....	万伯龙(169)
临城劫车案亲历记.....	李福生(197)
枣庄十一日记.....	陈无我(228)
记临城劫车案.....	刘子衡(269)
临城劫车案真象补遗.....	魏棟九口述 孔祥宏笔录(282)
附录	(285)
临城劫车案中的黄金荣.....	傅湘源(285)
编后	(295)

民国第一案始末

1923年5月6日凌晨2时30分，沿津浦铁路北上的第二次特别快车，在山东境内的沙沟、临城之间，被抱犊崮的土匪拦劫，除一名英国旅客当场被杀害、一名中国旅客和一名车警受伤外，其余的中外旅客200多人，被掳去抱犊崮山区。消息传出，轰动全国，触动各国驻华使团，这就是耸动国际听闻的“临城劫车案”。由于这是民国以来牵动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事件，所以也称“民国第一案”。

在民国初年，土匪掳人本是常事，官府从来不加过问，因为这次被掳的旅客中有许多外国人，加之那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地位，所以牵动了北洋政府、引起了国际交涉。英国驻华公使威胁北洋政府说：“自从庚子以来，贵国外交事件之重要，诚未过于此者”，限“于3日内全数救出被难外侨，逾期依时要求赔偿”。各国驻北京公使，都提出严重抗议，要以“无政府之国”对待中国。又于8月10日向中国发出“十六国通牒”，提出对被掳“洋人”进行赔偿和保护铁路运输等，并要“外国共管中国铁路”，即国际共管中国，威胁说此案将演变成“庚子义和团事件同样的后果”。

这一来，北洋政府的要员们慌了手脚，开会商议解救被掳旅客的办法，派要员去枣庄坐镇指挥，先以“所谓和平手段”、“权变办法”，屈尊降贵，与土匪对等谈判。由于官方解救外人心切，谈判时土匪要求的条件全部答复，致使匪方得寸进尺，要价越来越

高，谈判破裂，继而官方又采用“以剿为抚”的方针，调兵遣将，再次围剿抱犊崮，还以飞机在上空盘旋威吓土匪，终使土匪主动要求重开谈判，于是达成了协议，释放了全部“肉票”，接受招安，被改编成“山东新编旅”。

整个事件，高潮迭起，先有官军进剿抱犊崮的紧张局面，继有临城劫车事件的发生，进而出现了“官匪交涉”，八方冠盖云集枣庄；又因劫到了“洋人”而演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向北洋政府多次威胁，要求共管中国铁路；继又再向土匪交涉，并收编孙美瑶匪部，最后孙美瑶被诱杀，“山东新编旅”解体，历时7个多月了结全案。

当年抱犊崮的匪情

（一）

山东省的东南部，为多山地带，自泰山起，绵亘数百里。沂蒙山自北向南行，过费县境到抱犊崮，是其南端；徂徕山发脉于泰安县境，东南行，经滕县东入峄县（该县撤销，其辖区归枣庄市），到枣庄北的卓山，是其南端。沂蒙、徂徕两山脉的南端，相会于峄县境，构成了一个群山高耸的山区，这就是抱犊崮山区。

这个山区东西60余里，南北40余里，大部分在峄县境，整个山区海拔都在300公尺左右。在这个山区的东北角，矗立着一个海拔600公尺的大石柱形的主峰，在群山中显得有一柱擎天之势，那就是这个山区因以得名的抱犊崮。它为什么叫抱犊崮？传说古时有位道士发现崮顶上有平坦的一顷多地可以耕种，也是结庐修行的好地方，但要上去却很不容易，只有人工凿出的一些石头把手，要把牛牵上去是没法办的，但这位道士却想出了办法，把一头小牛犊抱到崮顶上喂养大，于是人们便起名叫抱犊崮。这抱犊崮山区北邻费县、滕县交界的全崮山，再向北连接费

县境内的梁丘山，西、南两侧都是平原，是津浦铁路和临枣支线所经过的地区。单以这个山区来说，北部有巨梁山、熊耳山、骆驼山；东部有九顶莲花山；西部有东鳊山、西鳊山；南部有运轂山、凤凰嶺、卓山等。对外交通只有从主峰抱犊崮的悬崖下，向西南经十里河、半湖、铁山沟、峨山口到达枣庄的一条大路。这条大路也只有从枣庄到峨山口之间可以通行牛车，其余大都是须经危崖峭壁的羊肠小道，行走非常危险。

整个山区可耕地很少，多是不长草木的贫瘠山岭，农民仅仅依靠山势修建零星梯田，因而生活极为困苦，丰收年景一年尚缺少三四个月的粮食，如遇荒年，更不堪设想，于是凡可以吃的树叶都会被及时收集起来，晒干了储存在屋里，准备冬春青黄不接时食用。

与贫穷互为因果的是教育极端落后，这样大的山区，从来没有设立过学校。俗话说“饥寒起盗心”，人们的贫困、愚昧，加以山区人强悍的性格，就容易铤而走险，流为盗匪。再加上历史背景的因袭，在思想观念上人们并不把当盗匪看作罪恶，于是这个山区就成为盗匪聚集的渊藪了。

民国初年，军阀各据一方，军队和土匪并没有多大区别；土匪被收编就是军队，军队被解散就是土匪，当兵和当土匪同是农村贫苦无告的人们的一种出路。不仅如此，倘若当土匪能形成“气候”，接收招抚，还是一步登天的捷径哩！曾做过直隶督军的褚玉璞，最初就是抱犊崮的土匪首领。在这种情形的鼓励下，凡是“光棍人物”，都有“大丈夫当如是也”的兴趣，这样，土匪就越聚越多了。因为这里土匪多，民国初年广东军阀龙济光，曾在这里招募土匪到南方去打革命军。再如湖南省督军张敬尧，也曾在这里招过兵。发生临城劫车案时，匪伙中的“军师”郭其才，就是张敬尧的招兵团团长，他把兵带到湖南被缴了械，便回抱犊崮正式当了土匪。

(二)

在抱犊崮主峰以西，熊耳山、骆驼山之间的南面，有一个居住着 30 多户人家的村庄，名叫白庄，这就是抱犊崮土匪头目之一孙美瑶的祖居地。

孙家，约有薄田 30—50 亩，若在山区以外，仅能算是小康之家，但在山里却是富户了。这份产业是干土匪挣来的，因为孙美瑶世代以干土匪为生涯。孙美瑶的祖父、父亲是什么样子，现在的人们已无从记忆；他的胞兄孙美珠，便是个很有名的“光棍人物”，那时在白庄一带提起他，差不多都会伸出大拇指称赞一句：“仁义光棍”。为什么他会有这种美誉？原来干土匪是卖命的生涯，但孙美珠用卖命换来的钱财，却毫不吝惜地周济穷苦乡邻，或做修桥补路等等“善事”。由于孙美珠有这种慷慨豪爽的性格，所以附近干土匪的人们，都愿跟着他跑，他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土匪拥戴为头目。1922 年冬季，他们这一伙人攻打西集圩子，孙美珠被守圩子的人打死了。孙美珠死后，这一伙土匪一时群龙无首，伙伴们几经计议，就把他的胞弟孙美瑶暂且“黄袍加身”，推为头目，这当然是对孙美珠的感念的表示。孙美瑶曾读过几年私塾，能记个“工夫帐”，谈不上什么学问，但人有点小聪明。他出身土匪世家，胞兄又是匪首，自然也常跟着匪伙跑跑，不过他所以当上土匪头目，与他有无本领或聪明无关，纯粹是继承父兄的余荫。

抱犊崮山区的土匪有很多伙，并不是只孙美瑶一个头目。临城劫车案发生前后，孙美瑶还默默无闻，没有人注意他，直到土匪接受招抚，收编为“山东新编旅”，孙美瑶一步登天，当上了旅长，人们这才知道孙匪其人。然而他为什么能平步青云？这里又有一个“机遇”：原来当官匪交涉收抚的时候，土匪中年龄较大的头目们，已经预感到事件的后果凶多吉少，都不愿出头，几经群

匪计议，才推出孙美瑶这个年仅 24 岁的匪雏当头目。孙美瑶年轻无知，竟然见猎心喜，乐于出头露面，忘记了祸国殃民的罪行，招抚不数月就被杀身死。

(三)

孙美瑶年轻无知，本来没有什么“业迹”可用笔墨，但因他后来当了“山东新编旅”旅长，一些文人始而加以渲染，于是撰出了许多关于他的传说。

有人渲染他的出身，说“孙美瑶是济南私立正谊中学的学生”；又有人说“孙美瑶曾为河南督军赵倜的武官”，并渲染“临城劫车案的政治背景，有日本浪人勾结安福系，同情豫督赵倜、赵杰（在日俄战争时，赵曾纠集马贼助日，得有三等勋章），特促成赵之旧部下孙美瑶用此野蛮手段，意在打击直系势力”；更有人说孙美瑶临城劫车案，是“山东省议会为驱逐鲁督田中玉的政治手法”。

这些传说，经求证于老峰县的有关人士，他们除深置怀疑外，记忆中，在孙美瑶当旅长之前，并无人知有孙匪其人，自然就无人听说他离开过抱犊崮山区，到外地上学及从事什么政治活动。再求证于史料，也无法找出确实的文字证据来。然而，为什么会有这些传说呢？1923 年《东方杂志》第 12 卷第 9 号上，有一篇《临城劫车后的官匪交涉》的记载，对解释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该文说：“临城土匪掳掠津浦车，架掳中外乘客一案，匪方用意虽狡，但当初他们所抱希望，决不如后此的那样奢，是可以断言的。乃驻北京的公使团张皇于先，中国官吏张皇于后，土匪看破隐衷，已有不易就范之形势；而国内一般无聊之徒，因此麇集枣庄，群想借此邀功，官僚政客纷纷以调人代表资格入山，对土匪胡乱提出条件，土匪便益存奢望，交涉便不易进行。”此文还说：“各派政客多入匪巢谋利用，颇使其手段。”对官匪交

涉一度中断一事，此文说“乃是误于政客入山的劝诱”。本来是单纯的土匪劫车事件，一经许多“无聊之徒”、“官僚政客”纷纷参加到事件里来，图谋“利用”，兴风作浪，于是就出现了对孙美瑶的种种想当然的传说。在纷纭的传说中，有一条却并非完全捕风捉影，即当时确有日本人企图潜入山中，想在临城劫车案中插上一脚。不过这又不同于某些人所说，是事前的预谋和勾结，事实是劫车案发生后的作为。

(四)

抱犊崮山区里的土匪多如牛毛，但每伙人数都不太多，最大的不过百余人，大多是几十人或二三十人一伙。在人们的记忆中，“临城劫车案”发生那个时期，各伙的匪首和人数，大致如下：

孙美瑶和他族兄孙美松这伙，计有 100 多人。周天松和同姓弟兄周天伦一伙，计有 100 多人。这是两个大伙，也就是后来收编土匪为“山东新编旅”时，周天松等分别当上了第一、第二团团长的原因。刘清源一伙，约 60~70 人。刘守亭（绰号馍馍刘）一伙，约 40~50 人。李振海一伙，约 20~30 人。陈元清一伙，有 20 多人。此外，还有张黑脸一伙，约 40~50 人；王继香一伙，约 30~40 人；王承全一伙，约 20~30 人；周虹龙一伙，约 30 多人；齐守江一伙，约 20 多人；任焕文一伙，约 20 多人；王二掌柜的一伙，约 20 多人；郭其才是一人一枪。再加上其他半民半匪的散匪，抱犊崮山区的土匪总共约有 1000 多人。

这些土匪并没有总头目，每一伙都是各自为政，互不统属。至于半民半匪的散匪，他们是遇有机会就参加做案，做完仍然回家种田或做其他营生；也许今天参加这一伙，明天又参加另一伙，是一种“打零工”的性质。但是，土匪们出山架票抢劫，往往是各伙临时集结起来，大批出动，有时会多到 200~300 人不等。他们临时集结起来，用共同遵守的分帐标准来公平分赃，所以，虽

然是临时集结，却也没有什么纠纷和争斗。据人们回忆，那时抱犊崮的土匪，是以做案时冒险大小，以及所带的枪枝好坏作为分帐标准：自来得手枪（即盒子枪）分双帐，三八式步枪分头帐，套筒子、汉阳造等步枪次之，土造五响、单打一等步枪又次之。在外面“把水”（即做案时的外围警戒）的人分帐最少，作“底线”（即报告架票的牵线者）的人，按这一票所得的总数一成或二成分帐，所得最多。

“盗亦有道”。土匪们为谋求生存，必须严格遵守的规矩之一，就是“兔子不吃窝边草”。这话虽然粗鲁，却有深刻的道理，因为“窝边草”是最好的掩护，吃掉它就暴露了自己，有被“犁庭扫穴”的危险，所以土匪们都禁忌在自己的家乡做案。抱犊崮的土匪也是如此，山区人们的任何财物，都不会被抢劫，甚至还受到妥善保护。土匪们一出山区，就横行无忌了，他们凶残成性，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在临城劫车案以前，被土匪们架去的“肉票”，约 200 多人。这些“肉票”，有远从昌潍、兖州、曲阜等地掠来的，大多数是山区附近各乡村较富裕的“土财主”。土匪们不只是“架票”，他们日常吃用的食物，都向山外的村庄去“喊”，要这些村庄去送。所要的物品，有面粉、猪肉、烟酒等等，一应俱全。如果那个村庄敢不照送，他们就来放火焚烧。临近抱犊崮山区的所有各个村庄，都被他们闹得天翻地覆，安份守己的老百姓不论穷富，都程度不同地受到骚扰和危害。

官军进剿抱犊崮

（一）

抱犊崮山区的土匪日益猖獗，猖獗到不只抢劫架票，而且不断焚烧村庄，达到无恶不作的程度。人们不仅要问，当时峰县不是有 13 个中队 1000 多人的保卫团么？他们不是由乡村百姓和

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出钱供养，为什么不去肃清土匪，保卫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其实，那时的保卫团，只不过是少数财主名绅的保镖，并不保卫人民群众。再加上保卫团和土匪都是当地人，相互间虽不“沾亲带故”，若叙起关系来，也总会攀上瓜葛，所以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保卫团在拿办土匪时，总是老远就放枪，到了村里要先在门前吆喝，好让土匪们从后门或跳墙逃跑，这样怎么能够剿灭土匪呢？平时，保卫团对于抱犊崮山区的主要任务，不是剿匪，而是防守，他们在山区边缘防守着各出入路口，摆下吓阻的架式，实际并不管事。因此，土匪能够很容易地出入山区，滋生蔓延，祸害百姓。地方上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与棘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状告到省里，请求上级官府来剿办。最初，官府无动于衷，经过老百姓们再三向省城告状，在1923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始有北洋政府的官军开来。官军进剿的部署是：

1. 主力部队是北洋政府的第二十旅，旅长是吴长植，他带领所属的一个团（团长王纶阁），进驻峨山口，并配备有峰县保卫团300名。峨山口是进入抱犊崮山区的主要通道。吴长植担任进剿军队总指挥官。

2. 兖州镇守使兼山东第六旅旅长何锋钰，带领一个团，配备峰县保卫团若干名，担任抱犊崮西面的游击。

3. 原驻防在临沂的山东第五旅，抽调来约两个团，由旅长张培荣带领，配备峰县保卫团若干名，担任抱犊崮东面的游击。

这是一个声势相当强大的进剿态势，老百姓也寄予厚望。

（二）

北洋政府的官军，对于成股的土匪，一向是采取剿办为名，招抚为实的策略，因为招抚土匪是增加军阀们实力的一个妙法，在表面上也算解决了土匪问题，这就是形成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兵匪混淆不清的主要原因。第二十旅旅长吴长植，对于这个

问题自有其心得，所以他到达峨山口后，就以总指挥官的身份，具名派人给抱犊崮的土匪们送去一封招降信，当时人们称之为“下战书”。这封信的大意是说：希望土匪们释放从各地掳来的“肉票”，缴出枪械，各自回家做老百姓，官军保证不追究或杀害他们。下书的日期是在1923年4月中旬。

大约沉寂了三四天，土匪们派人把复信辗转送来了。复信的原文是：“第六旅纪律拉杂，勾结地方恶绅劣绅，鱼肉小民，甚至剥鸡盗狗，无恶不作，山中百姓，受我抚恤，服我劳役，卧榻之旁，理应扶而有之。倘攻我本部，我即扰其防区”。具名人是：刘守亭，即绰号“馍馍刘”的那个极为凶残的匪首。这是一封似通非通的复信，如果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来很难了解其中的含义。它的含义包括如下三个要点：

1. 开始即痛骂何锋钰的第六旅，对吴长植来说，无异“指桑骂槐”，表示对所有官军的轻视与不满。

2. 土匪们已把抱犊崮山区看作他们的地盘，俨然以“独立王国”自居，这对于当时割地自雄的军阀来说，实际是一种无情的讽刺。

3. 透露出一个讯号，即“倘攻我本部，我即扰其防区”。他们不害怕官军的进剿，他们要对抗，并以向山外窜扰相威胁。

吴长植得信后的第一个措施是，立即通令附近各县加强戒备，以防土匪们出山窜扰。同时，他也产生了另一个警觉，即当民国八、九年间（1919～1920年间），豫西一带有一股哨聚了八九万人的土匪，总头目是任应岐，其中有一个匪首名张庆，临汝县人，其貌似“洋人”，绰号“老洋人”，这股土匪遂以张庆的绰号对外号召，流窜鄂皖一带，为害极为严重。后来“老洋人”劫持了真“洋人”——外籍传教士，要挟官府收编。现在，吴长植面对抱犊崮的土匪企图向外窜扰的威胁，意识到外籍传教士的安全，所以他在命令各县加强戒备的同时，要求各县特别注意保护“洋人”。